

## 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之子女在族群自我 認同與族群態度上之表現

鍾才元\* 林惠蘭\*\*

---

\*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副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tchung@go.utaipei.edu.tw

\*\* 宜蘭縣南澳鄉東澳國小教師  
E-mail: lan10083@gmail.com

# airiti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籍男性與原籍東南亞之女性聯姻之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上之表現以及此二者與自尊之關聯性。研究對象為78位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其母親均為來自東南亞之新移民。學生們在問卷上勾選自己的族群身分，在態度量表上表達對父方與母方族群之主觀感受，並填答一份自陳式自尊量表。研究發現如下：一、新移民子女中，雙族群認同者的比例最高（48位；61.5%），其次為父方族群認同者（18位；23.1%）及情境身分認同者（10位；12.8%）；母方族群認同者與邊緣身分認同者各只有1位。二、新移民子女之族群態度受其族群自我認同型態與族群分類（父方vs.母方）的交互作用影響。雙族群認同者對父方族群之評價高於情境身分認同者；父方族群認同者對母方族群之評價低於雙族群認同者。三、整體而言，新移民子女之族群態度愈趨於正向者，其自尊亦有較好的表現，然就族群自我認同型態間進行比較時，雙族群認同者之自尊表現優於父方族群認同者。根據以上發現，研究者針對新移民子女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之影響因素加以討論，並對後續研究與實務工作提出建議。

**關鍵詞：**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態度、自尊、東南亞女性移民、新移民子女

# airiti

## 壹、前言

自2005年起，臺灣男性與東南亞或大陸籍女性通婚的人數大幅度增加，這些跨國婚姻所生之子女就讀於各教育階段的人數也因而逐年攀升，其人數與比例均至不容小覷的地步，遂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研究。惟以往的研究偏重於這些女性新移民之子女的學業適應或學校生活適應，對他們在二種語言與文化家庭環境下的社會化歷程卻著墨甚少（馮涵棣、梁綺涵 2008）。族群認同乃個體社會化歷程的重要內涵，但我們對新移民之子女在此方面的表現其實所知不多。在臺灣的族群生態下，新移民子女會以何種族群身分稱呼自己？他們在族群態度上是否對父方與母方族群持有同等的評價？他們對個人族群身分的看法以及對族群的態度是否又與其心理適應有關？這些問題，無論就理論或實務而言，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就理論上而言，研究結果有助於瞭解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與相關影響因素。就實務上而言，研究發現可幫助教育或社會工作者正確地認識這些跨國婚姻子女，避免因誤解而採取了不宜甚至錯誤的教學或輔導作為。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國小五、六年級（11-12歲左右）的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為對象，調查他們的族群自我認同以及他們對父方與母方族群的態度。國小高年級學童已進入或正要進入青春期階段，在認知成熟度上足以勝任抽象思考問題，且正積極地尋求自我認同與團體認同（Erikson 1968）。除此之外，本研究亦試圖探討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自我認同型態及族群態度是否與其自尊表現有關，藉以瞭解族群認同與心理適應之關聯性。

## airiti 貳、文獻探討

### 一、新移民及其子女

自1998年起，臺灣開始進入所謂的「少子化」(the trend of declining birthrate)的人口發展趨勢。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4a)的統計，臺灣在1997年的新生兒人口數仍有307,406，但2010年已跌至157,282，每年平均跌幅約為5%。臺灣的總生育率，自2003年起即逼近超低生育率(lowest-low)的水準(王德睦、劉一龍 2008；劉一龍、王德睦 2005)，2010年則首度低於1.0，致使美國人口文獻局(U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亦直指此數字創下全球歷史新低水準(陳玉華、蔡青龍 2011)。幸好在少子化的同時，臺灣社會湧現一股跨國婚姻的熱潮，不僅帶來許多新的面孔，也為人口發展帶來新的契機。政府與大眾媒體通稱跨國婚姻來臺定居的外籍人士為「新移民」，惟此類跨國婚姻主要由臺灣男性與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女性所結合，所以新移民亦絕大多數為東南亞籍或大陸籍女性。由於本文探討父母分屬不同族群之兒童的族群認同，為避免概念(即族群與語言團體)之混淆，將僅聚焦於東南亞籍之女性新移民與其子女，而不包含大陸籍女性新移民及其子女，因大陸籍女性新移民與其臺灣配偶常有所謂的「同文同種」的現象。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4b)的統計，自1997年起至2012年止，因婚姻而歸化的東南亞女性人數為101,820人，其中以來自越南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印尼。由於國籍法規定，外籍配偶需每年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且繼續三年以上始可申請歸化，因此實際在臺定居的東南亞女性新移民人數肯定多過於歸化人數。內政部移民署(2014)之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12月止，來自越南、印尼、柬埔寨、菲律賓、泰國、緬甸及馬來西亞等七國的外籍配偶

已有137,349人。東南亞女性選擇嫁到臺灣，主要基於經濟因素（王宏仁 2001；夏曉鵬 2000；馮涵棣、梁綺涵 2008），一方面藉此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另一方面也可讓自己有較好的生活條件。她們大多數都很年輕，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以越南籍女性新移民為例，結婚的年齡約在25歲左右，平均受教育年數為7年，相當於臺灣小學畢業的程度，而她們的臺灣配偶則通常比她們年長十歲以上（王宏仁 2001；馮涵棣、梁綺涵 2008），平均受教育年數為10年，相當於國中的程度，且主要以務農、從事低技術性勞力工作、或經營小生意等為業（王宏仁 2001）。這些東南亞女性嫁來臺灣後，大多數被夫家賦予傳宗接代的責任，且通常很快的就生育且在幾年之內連生二胎或三胎；她們所生的子女或多或少減緩了臺灣「少子化」的人口發展趨勢（莫藜藜、賴珮玲 2004；馮涵棣、梁綺涵 2008）。

東南亞籍新移民的子女陸續進入學校就讀以後，在各教育階段的人數與比例也隨即逐年攀升。教育部統計處（2014a, 2014b）的資料顯示（見表1），94學年度就讀於國小階段的東南亞籍新移民子女僅有31,746人，占學生總人數之1.73%；101學年度的人數已高達100,712人，占7.33%；102學年度的人數略有下滑，但其比例仍有7.45%。從人口比例來看，新移民的子女已經成為臺灣未來人才的主要來源之一。

然而，由於新移民的臺灣配偶多屬經濟弱勢族群，新移民本身教育程度不高且初到臺灣還無法說一口流利的本地語言，社會大眾因而擔心她們的小孩會有語言發展遲緩現象、上學後會出現學習困難等（莫藜藜、賴珮玲 2004），以至於會影響下一代的人口素質，降低國家競爭力（馮涵棣、梁綺涵 2008）。也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許多人會擔心新移民子女進入學校系統後是否會受到同學的排擠，以致於產生人際關係或社會適應的困難（張芳全、夏麗鳳 2011）。基於上述的疑慮，以往有關新移民子女之研究，亦主要偏重於他們的學業表現與學校生活適應。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在國小各領域的學業成就

表1 自94學年度起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就讀國小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學生總人數	新移民子女數							馬來西亞
		越南	印尼	柬埔寨	菲律賓	泰國	緬甸		
94	1,831,873	31,746	13,067	579	3,420	2,183	1,133	1,079	
95	1,798,393	42,391	16,197	1,096	3,902	2,576	1,643	1,158	
96	1,754,095	54,776	18,694	1,795	4,230	2,860	1,698	1,231	
97	1,677,439	68,862	20,637	2,532	4,231	3,119	1,737	1,217	
98	1,593,398	81,102	21,400	3,184	4,104	3,221	1,949	1,178	
99	1,519,746	91,378	21,277	3,731	3,988	3,109	1,936	1,133	
100	1,457,004	98,562	20,726	4,053	3,750	3,072	1,758	1,009	
101	1,373,366	100,712	19,008	4,133	3,461	2,907	1,571	967	
102	1,297,120	96,646	16,595	3,929	3,172	2,703	1,449	964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4a, 2014b）公布之資料重新製表。

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現象（王世英等 2006；姚如芬 2009；鍾鳳嬌、王國川 2004），其中又以數學方面較為明顯，從國小開始就處於低成就者居多，到了國中階段有每況愈下之趨勢（王世英等 2006）。然吳毓瑩、蔡振州（2014）認為，母親身分並非新移民子女之低學業成就的關鍵因素，因渠等發現，新移民子女在國小一年級的學業成就雖落後控制組（指班級、父親教育程度與性別均相同之一般學童），但到了三年級時，二者已無顯著差異。在生活適應方面，新移民子女在國小與國中階段的適應情形大致良好或尚可（吳瓊迦、蔡明昌 2009；張芳全、夏麗鳳 2011；黃素惠、徐偉培 2008）。

相較於新移民子女之學業表現與學校生活適應，他們的族群認同則鮮少被探討與研究。族群認同乃個體基於族群歸屬感而在想法、態度與行為上與所屬族群建立連結的心理歷程（Aboud 1987），其中的二個基本要素即族群自我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與族群態度（ethnic attitudes）。前者係個人對其族群身分之理解與選擇，後者則指個人對族群之主觀評價、情感投入與互動參與。族群自我認同，如同性別角色認同，乃個體自我概念之重要成分（Erikson 1968; Harter 1999）；族群態度則不僅影響個人與族群成員的互動頻率與方式，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人的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Aboud 1987; Phinney et al. 2007; Poston 1990）。

在臺灣，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有著很不尋常的族裔背景。他們的父親雖然是臺灣人，但他們並不被認為是多數族群，因為他們是所謂的「雙族裔個體」（bi-ethnic individuals），而且清一色是父親來自多數族群而母親來自少數族群的個體。根據國際法的觀點（Šmihula 2009），新移民的子女其實應歸類為少數族群。由於他們的雙族裔背景，新移民子女經常會面臨父母雙方族群文化不一致或價值衝突的情況（李國基 2008；馮涵棣、梁綺涵 2008），因而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很可能會產生非新移民家庭子女所沒有的心理困擾。研

究顯示，雙族裔者常會有意或無意地隱藏或拒絕自己的其中一種族群身分（Root 1990a, 1990b），或視自己為一種特別的族群或所謂的「邊緣人」（Breland 1998; Kerwin et al. 1993）。在臺灣的族群生態下，這些女性新移民的子女會不會隱藏或拒絕他們的族群身分或把自己看成是邊緣人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們會以哪一種族群身分來稱呼自己？他們對自己所屬的二個族群是否會有差別性的評價？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從消極面而言，這方面的研究有助於瞭解這些具有雙族裔背景的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認同方面的表現；從積極面而言，研究結果亦可提供教育或社會工作者在設計與安排教學或輔導措施時之重要參考。

## 二、雙族裔者之族群自我認同

雙族裔個體與其他父母同屬一個少數族群或分屬二個少數族群的個體之成長經驗並不全然相同（Poston 1990）。因此，Poston認為，以一般少數族群的自我認同發展模式來理解雙族裔個體自我認同發展有若干不當之處，如假定雙族裔個體一定會在二個族群中擇一認同、認為他們會先拒絕其弱勢族群身分、以及未考慮到他們可順利整合族群身分的可能性等。Poston因而提出「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試圖更妥切地描述雙族裔者的自我認同歷程。此模式將雙族裔個體之自我認同發展區分為五個階段。學齡前屬於「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階段，兒童會發展出自我概念，然此自我概念與族群幾無關聯性。年齡再大一些的兒童則步入「族群類別選擇」（choice of group categorization）的階段，意指他們會感覺到社會（如家庭、同儕或社會團體）要他們選擇一種族群身分，若不如此則無法參與或隸屬於該族群或團體。Hall（1980, cited in Poston 1990）發現，此階段的雙族裔兒童通常不是同時認同於父母雙方的族群、就是僅認同於較強勢的族群，而且所作的選擇主要受到地位因素（status factors）、社會支持因素（social support



factors) 及個人因素 (personal factors) 所影響。地位因素指的是族群在社會上的相對地位、在社區的人口比例、以及同儕團體內的族群組合或屬性；社會支持因素泛指父母教養方式與影響、父母或家庭對族群文化的接納度與參與度等；個人因素指體型特徵、族群語言流利程度及族群文化知識之多寡等。約莫進入青春期中以後，亦即「掙扎／否認」(enmeshment/denial) 階段，雙族裔個體會因為選擇一種族群身分而感到迷惑甚至有罪惡感，也常會有感到不完全被族群接納的經驗。其後是「欣賞」(appreciation) 階段，雙族裔個體雖然還是僅認同於一個族群，但開始能夠體會同時擁有二個族群身分的好處，擴大其族群參照，學習另一族群文化並參與相關活動。在最後的「整合」(integration) 階段，雙族裔個體願意承認所擁有的全部族群身分，且最終發展出安全而整合的自我。

根據上述的自我認同發展模式，就讀於國小高年級的新移民子女應正處於族群類別選擇階段，會基於團體隸屬或人際互動之需求而選擇一個族群類別來稱呼自己。那他們的實際表現又會如何呢？有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先從美國雙族裔者在族群自我認同的表現獲取有益的比照。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有許多不同的雙族裔類型，具有雙族裔或多族裔身分的國民更是比比皆是。然而，由於歷史因素，雙族裔者族群認同的探討與研究主要以擁有歐洲裔及非洲裔血統之人士（即俗稱的黑白混血兒）為對象。此歷史因素即自19世紀始存在於美國社會（尤指南方各州）的「一滴血規則」(one-drop rule) 傳統 (Hickman 1997; Roth 2005)。根據此傳統，小孩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只要有一人是有色人種（通常指黑人），即必須被歸類為有色人種 (Brunsma and Rockquemore 2001; Root 1990a)。在此傳統下，黑人與白人所生的小孩，即使父親是白人，都會被認定為有色人種。黑白雙族裔者通常也會以社會賦予的族群身分 (ascribed ethnic identity) 當作是自己的族群身分。

自20世紀中葉以後，人權運動的蓬勃發展讓這種情形逐漸產生

改變。眾多雙族裔族群或多族裔族群不願意接受社會公認的族群身分。他們宣稱，僅選擇社會公認的族群身分等同於強迫他們放棄或否認他們身上的其他部分（Gaskins 1999）。美國聯邦政府為順應民意因而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調查在普查表格中新設一個族群類別可能會產生的政治與社會效應（Holmes 1997）。美國2000年的普查雖未新增一個「多種族」（multiracial）的類別，卻允許美國公民勾選二或三個以上的類別（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0, cited in Lusk et al. 2010）。此次普查中，超過六百萬（2.4%）的美國公民勾選二或三個以上的種族類別，其中有784,764人自認為同時擁有黑白二種族群身分（Lusk et al. 2010）。

在美國2000年普查之前，已有研究發現，族群背景相同的雙族裔者在族群自我認同上有很大的個別差異（Helms 1995），甚至連雙族裔的手足所自認的族群身分也不盡然相同（Root 1998）。學者們因而主張，雙族裔者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其實可以有若干策略或選擇（Renn 2000; Roccas and Brewer 2002; Rockquemore 1998; Rockquemore and Brunnsma 2002; Root 1990a）。Rockquemore即認為，黑白雙族裔者至少有四種身分可以選擇：（一）單族群身分（singular identity），即自認為是黑人或自認為是白人；（二）雙族群身分（bi-ethnic identity），即自認為是白人、也是黑人；（三）情境身分（situational identity），即自認為族群身分視情境而定，可以是黑人、可以是白人、也可以是雙族群身分者；（四）邊緣身分（marginal identity）或超然族群身分（transcendent identity），即自認為不屬特定的族群或不願意以族群來界定自己的身分。後來的一些研究也的確驗證了雙族裔者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的多樣性（Brunnsma and Rockquemore 2001; Coleman and Carter 2007; Lusk et al. 2010; Rockquemore and Brunnsma 2002）。以其中的二個研究為例（見表2），上述四種認同型態的人數各占有不少的比例，其中雙族群認同者的比例明顯地高於其他型態。

表2 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之跨研究比較表

自我認同型態	研究一 (N = 161)	研究二 (N = 74)
單族群身分	16.7% (28)	20.2% (15)
雙族群身分	61.3% (103)	52.7% (39)
情境身分	4.8% (8)	17.6% (13)
邊緣身分	13.1% (22)	9.5% (7)

資料來源：Lusk et al. (2010)。

註：研究一：Rockquemore and Brunma (2002)；研究二：Lusk et al. (2010)。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將焦點轉回臺灣的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的族群自我認同會不會有類似美國雙族裔者的表現呢？臺灣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一滴血規則」，但基於父系社會的傳統，許多人會不假思索地認定新移民子女就是臺灣人，甚至也會一廂情願地認為新移民子女也會自我認為臺灣人。此想法自有其合理性，畢竟新移民子女繼承父姓、在臺灣長大及接受教育等，但這種想法真的就是所有新移民子女的想法嗎？下面這一段第二作者在教室裡所聽到的爭執，似乎透露相當不同的訊息：

「我們是越南人」其中一位學生說。

「才不是呢！我們不是越南人，我阿嬤說我是臺灣人」另一位學生不以為然地反駁。

上述的爭執所透露的訊息是，族裔背景相同（如父為臺灣人、母為越南人）的新移民子女對個人的族群身分不見得有一致的看法。由現有的二個質性研究（李國基 2008；馬藹萱 2005）的發現看來，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似乎是相當多元的。馬藹萱訪談就讀於國中的20位跨國婚姻子女（母親皆來自東南亞）後發現，這些學生當中有只認同於一種身分（臺灣人；混血兒；馬來西亞人；華僑等）、

認同於二種身分（華僑／菲律賓人；臺灣人／外國人；混血兒／臺灣人）、認同於三種身分（臺灣人／華僑／閩南人；華僑／馬來西亞人／混血兒；混血兒／外國人／泰國人）、甚至認同於四種身分（臺灣人／混血兒／菲律賓人／外國人；華僑／外國人／菲律賓人／混血兒）的現象。整體而言，約有65%的受訪者認同於二種以上的族群身分，35%的受訪者呈現單一族群認同。李國基以七位就讀於國小五、六年級的東南亞女性新移民子女為深度訪談對象。他的發現是，有些新移民子女會陷入個人自我認同與外界認定不一致的窘境（如外界認定他們是「混血兒」、但母親卻說他們不是「混血兒」）；在七位新移民子女中，有一位認同父方族群而排斥母方族群，一位認同母方族群而排斥父方族群，而其餘五位（62%）則認同父方族群且不排斥母方族群。

由以上二個質性研究的發現看來，新移民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隱然有美國雙族裔者所表現的多元現象。因此，我們似可假定，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會有下列五種表現型態：

- （一）父方族群認同：自認是父方族群的一份子（「我是臺灣人」）。
- （二）母方族群認同：自認是母方族群的一份子（如：「我是越南人」）。
- （三）雙族群認同：自認同時屬於父母雙方族群（如：「我是臺灣人，也是越南人」）。
- （四）情境身分認同：自認族群身分視情境而定（如：「有時候是臺灣人、有時候是越南人」）。
- （五）邊緣身分認同：自認不屬於特定的族群。

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是否會表現出上述所假定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目前尚未有研究加以驗證。有鑒於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於驗證這些女性新移民之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的多樣性，並識別出他們主要的認同型態（研究問題之一）。

### 三、雙族裔者之族群態度

族群態度通常被定義為一種具有評價性的心理傾向，使個體在面對不同族群的成員時會以有利或不利的方式反應（Aboud 1987）。族群態度的研究顯示，無論是成人、青少年或兒童都有偏好自己所屬族群的傾向。舉例而言，在朋友的選擇（Levin et al. 2003; Shams 2001）、鄰居（Valk and Karu 2001）、人格特質描述（Rustemli et al. 2000）、或態度評量（Griffiths and Nesdale 2006）等方面，成人與青少年都會表現出「內族群偏好」（in-group preference）。惟必須一提的是，內族群偏好並不必然等同於對其他族群之仇視（Griffiths and Nesdale 2006）。

對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而言，父方族群與母方族群是他們最重要的二個族群，但他們是否會因為其中一個族群（父方）是社會上的強勢族群而有差別性的族群態度呢？更具體地說，相對於母方族群，他們會不會給予父方族群較好或較為正面的評價？在臺灣，對此問題持肯定看法的人或許不在少數，但這種思維未必就是事實。這種看法屬於所謂的「單向度族群認同模式」（unidimensional model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亦稱「二極族群認同模式」（bi-polar model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而此模式並無法完整地說明少數族群（如非裔或墨裔美國人）或雙族裔族群（如美國黑白雙族裔者）族群認同的多樣性（Hutnik 1991）。根據此模式，對強勢／主流族群之高度認同即等同於對弱勢／少數族群之低度認同；反之亦然。然而，許多少數族群及雙族裔者的經驗與此認同模式並不一致，原因在於此模式排除了同時認同於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的可能性。因此，學者們主張以雙向度族群認同模式（two-dimensional model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來探討少數族群或雙族裔者之族群認同（Berry 1997; Hutnik 1991; Nguyen et al. 1999），其理由是此模式可以較為完整地描述族群認同的多樣性。在雙向度模式中，少數族群或雙族裔者可同時高度地認同於強勢

族群與弱勢族群，亦可僅認同於其中一個族群，或對二個族群都只有低度的認同等。

就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而言，我們亦可從雙向度模式的觀點來探討他們的族群認同，因為他們除了可以單純地認同於父方或母方族群之外，也的確有同時認同於父方及母方族群的可能性。採取此模式的前提是必須同時測度新移民子女對父母雙方族群的態度。然而，由於新移民子女很可能從小即被灌輸「他們是臺灣人」的想法，而且也可能對父母雙方族群在社會上的相對地位有所體認，以致於他們可能對父方族群才有所謂的「內族群偏好」，其具體表現則是對父方族群與母方族群會有差別性的評價。有鑒於此，本研究想探討的是：「新移民子女是否對父方族群與母方族群有差別性的族群態度？（研究問題二）」此外，本研究亦將探討另一個與族群認同緊密相關的問題，即「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自我認同如確有多元型態，則他們對父方或母方族群的態度是否也會因而有所差異？（研究問題三）」。

#### 四、族群自我認同與自尊之關聯

最後，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的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的個別差異是否會反映在心理適應方面？就整體新移民子女而言，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都會遭遇到或多或少的異樣眼光或不公平對待（李國基 2008；張敏華 2005），而這些由族群身分所帶來的不愉快經驗很有可能會影響他們對個人自我價值的看法。一些研究顯示，雙族裔者會隱藏或拒絕承認自己的族群背景或視自己為「邊緣人」（Breland 1998; Kerwin et al. 1993; Root 1990a, 1990b），但也有一些研究顯示，雙族裔者如能順利整合父母雙方族群的文化資產反而會有較好的心理適應（Binning et al. 2009; Coleman and Carter 2007）。以Binning et al.（2009）所研究的雙族裔高中生為例，同時認同二種族群身分的學生，相較於僅認同單一族群認的學生，表

現較多的正向情緒（positive affect）與較低的壓力感受（stress）。Coleman and Carter（2007）也發現，雙族群認同者有相對較低的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與憂鬱（depression）的傾向。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女性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與其心理適應也會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本研究以自尊（self-esteem）做為新移民子女心理適應的指標，因自尊乃個人自我價值感（Rosenberg 1979），是心理適應的重要指標（Harter 1999）。研究發現，美國黑白雙族裔者的自尊表現與其族群自我認同息息相關（Bracey et al. 2004; Lusk et al. 2010），且雙族群認同者的自尊表現高於其他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者（Lusk et al. 2010）。有鑑於此，本研究亦試圖驗證新移民子女是否亦有此現象，亦即雙族群認同者是否比其他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有相對較高的自尊表現（研究問題四）。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抽樣地區為基隆市，惟許多學校顧慮新移民子女的隱私權會受損與受標籤效應之負面影響而婉拒參與，致隨機抽樣程序無法進行。研究者最終僅能在十所同意參與的學校進行資料蒐集。受試者為就讀於五或六年級且母親為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移民之學生共214位，其中136位的母親來自中國大陸，78位的母親來自東南亞（越南42位、印尼14位、菲律賓6位、緬甸6位、泰國5位、柬埔寨4位、馬來西亞1位）。由於大陸籍女性新移民與其臺灣配偶常有同文同種的現象，為避免造成概念（即族群與語言使用團體）之混淆，本研究僅以東南亞籍新移民子女（男生38位、女生40位）的資料進行分析。

## 二、實施程序與研究工具

參與學校要求研究者不可直接接觸學生、但可透過級任教師進行資料搜集，因此研究者請級任教師將問卷交給班上的新移民子女填寫。學生以個別且無記名方式填答問卷，並於完成後交給教師，教師再將問卷轉交給研究者。問卷有以下三個部分：基本資料調查表、族群態度量表、與自尊量表：

- (一) 基本資料調查表：此調查表問及學生之就讀年級、性別、父親的家鄉、母親的家鄉、以及受試者之族群自我認同型態。在族群自我認同部分，本研究採取以往研究者所使用的方式（Coleman and Carter 2007; Lusk et al. 2010; Rockquemore and Brunsma 2002），由受試者從所提供的選項中勾選一個自認擁有的族群身分。問題為：「我覺得自己：（請勾選其中一個）」，所提供的選項有：「是臺灣人，也是母親國家的人」、「有時候是臺灣人，有時候是母親國家的人」、「是臺灣人」、「是母親國家的人」、以及「不是臺灣人，也不是母親國家的人」。
- (二) 族群態度量表：此量表用於測度受試者對父母雙方族群的態度，題目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Doyle and Aboud 1995; Doyle et al. 1988）設計而成，內容涵蓋族群認知印象（如「我覺得母親國家的人是有能力的」）、情感投入（如「我喜歡媽媽家鄉的故事」）、以及人際互動之傾向（如「我喜歡和媽媽家鄉的人相處」）。此量表共二組題目，採成對設計（如「我喜歡和臺灣人做朋友」與「我喜歡和母親國家的人做朋友」），父方與母方族群各有13題。

研究者先以臺北市及新北市四所國小65位五、六年級學生進行此量表之預試，並以所得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其取樣適切值（KMO）為 .815（父方）與 .845（母方），球形檢定均達顯



著水準。因素分析（主成分法、最大變異法轉軸）之結果顯示，父方族群題目只萃取出一個因素（特徵值為5.22，解釋變異量為40.13%），母方族群題目亦只萃取出一個因素（特徵值為6.96，解釋變異量為53.57%）。研究者將二個部分一致的題目（共22題）重新編輯為族群態度量表。每一題有五個選項（「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普通」、「符合」、「非常符合」），分別記分為1至5分。每位受試者可得二個分數（父方族群態度分數與母方族群態度分數），各由11題之分數加總而成，分數愈高，代表其族群態度愈趨於正向；二組題目的alpha係數分別為.91與.94。

- （三）自尊量表：此量表取自陳佳伶（2007）編製之「國小高年級學童自尊問卷」，用以評估新移民子女之自尊表現。此問卷由18個題目所組成，因素分析顯示其內含二個向度：自我效能感（如「我能幫父母做家事」）與自我價值感（如「我覺得自己優點多於缺點」）；前者特徵值為5.32，後者特徵值為5.17，合計解釋變異量為42.38%。受試者在五個選項中勾選作答，其選項有：「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常常如此」、「總是如此」（記分為1至5）。本研究以所有題目加總後之分數進行分析，受試者之分數愈高，代表其整體自尊愈高；此量表之alpha係數為.89。

## 肆、研究發現

### 一、族群自我認同

本研究首先就新移民子女在族群身分上的選擇（見表3）加以分析，藉以瞭解他們在族群自我認同方面的多樣性，並識別出他們主要的認同型態（研究問題一）。以年級、性別、學校規模、及母親原

表3 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自我認同表現與卡方檢定結果

變項	類別	族群自我認同型態 <sup>1</sup>					$\chi^2$ (df)
		雙族群	父方族群	情境身分	母方族群	邊緣身分	
年級	五	28	8	8	1	1	4.80 (4)
	六	20	10	2	0	0	
性別	男	19	11	7	0	1	6.53 (4)
	女	29	7	3	1	0	
學校規模 <sup>2</sup>	小	8	3	2	0	0	14.55 (8)
	中	33	15	4	1	0	
	大	7	0	4	0	1	
母親原國籍	越南	26	9	5	1	1	1.89 (4) <sup>3</sup>
	非越南籍	22	9	5	0	0	
全體		48	18	10	1	1	97.00 (4) <sup>***</sup>

註：<sup>1</sup>雙族群認同=「是臺灣人，也是母親國家的人」；父方族群認同=「是臺灣人」；情境身分認同=「有時候是臺灣人，有時候是母親國家的人」；母方族群認同=「是母親國家的人」；邊緣身分認同=「不是臺灣人，也不是母親國家的人」。

<sup>2</sup>根據班級數分類，小型為24（含）班以下，中型為介於25至48班，大型為49（含）班以上。

<sup>3</sup>由於7×5之交叉表產生較多無觀察值之細格，所以此檢定係將母親原國籍為印尼、菲律賓、緬甸、泰國、柬埔寨及馬來西亞之兒童合併為一個類別（非越南籍），並以2×5之交叉表進行分析。

\*\*\* $p < .001$

國籍等變項分別與族群認同型態進行卡方檢定之結果顯示，卡方值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並不因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或母親原國籍而有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全體受試者合併處理，其結果為：在78位受試者中，有48位（61.5%）屬雙族群認同者，18位（23.1%）屬父方族群認同者，10位（12.8%）屬情境身分認同者；母方族群認同者與邊緣身分認同者各只有一位。就上述五個認同型態的人數進行卡方檢定之結果為： $\chi^2(4) = 97.00$ ， $p < .001$ ，可見此五種型態之分配機率並不均等。由上述的百分比推估，雙族群認同乃新移民子女族群自我認同之主要型態，其次是父方族群認同。

## 二、族群態度

表4為新移民子女在族群態度量表上的表現，並依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母親原國籍、及族群認同型態等五個變項分別呈現。需先說明的是，新移民子女的父方族群態度分數與母方族群態度分數互為正相關， $r(76) = 0.501$ ， $p < .001$ ，意指對其中一個族群有較正向評價者，對另一個族群之評價亦有較為正向的傾向。由於二個族群態度變項屬重複量數，因此本研究採用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Repeated-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藉以檢定新移民子女是否對父方族群與母方族群有差別性的族群態度（研究問題二），並檢定

表4 新移民子女族群態度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受試者間因子	類別／水準	族群分類（受試者內因子）			
		父方		母方	
		M	SD	M	SD
年級	五（ $n = 46$ ）	47.37	6.33	44.46	8.38
	六（ $n = 32$ ）	48.38	6.68	44.38	8.97
性別	男（ $n = 38$ ）	46.37	6.67	42.58	8.24
	女（ $n = 40$ ）	49.13	6.02	46.18	8.61
學校規模	小（ $n = 13$ ）	50.08	5.16	46.77	5.12
	中（ $n = 53$ ）	47.89	5.99	43.17	9.34
	大（ $n = 12$ ）	47.42	8.78	44.83	7.01
母親原國籍	越南籍（ $n = 36$ ）	47.86	5.94	44.40	9.05
	非越南籍（ $n = 42$ ） <sup>1</sup>	47.69	7.09	44.44	8.10
族群認同型態	雙族群（ $n = 48$ ）	49.56 <sup>a</sup>	5.42	47.21 <sup>a</sup>	6.29
	情境身分（ $n = 18$ ）	41.20 <sup>b</sup>	6.63	43.00	7.92
	父族群（ $n = 10$ ）	46.89	6.97	37.00 <sup>b</sup>	10.06
	母族群（ $n = 1$ ） <sup>2</sup>	46.00	-	48.00	-
	邊緣身分（ $n = 1$ ） <sup>2</sup>	46.00	-	55.00	-

註：同一變項內各類別平均數之上標字母不同者表彼此間差異達顯著水準（ $p < .05$ ）。

<sup>1</sup>係指母親原國籍為印尼、菲律賓、緬甸、泰國、柬埔寨及馬來西亞之兒童。

<sup>2</sup>由於人數過少，未包含於變異數分析之內。

其族群態度是否因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或母親原國籍之不同而有差異。在上述變異數分析中，年級、性別……等為受試者間因子，族群分類（父方vs.母方）為受試者內因子。

年級部分的分析結果顯示，年級效應與交互作用效應未達顯著水準，然族群分類效應則達顯著水準， $F(1, 76) = 14.99, p < .001$ 。有關性別的部分，性別效應達顯著水準， $F(1, 76) = 4.84, p < .05$ ，族群分類效應也達顯著水準， $F(1, 76) = 14.68, p < .001$ ，但性別與族群分類之交互作用效應未達顯著水準。由表4可看出，女生對父方族群與對母方族群的評價分數均高於男生。在學校規模部分，主效應與交互作用效應未達顯著水準，然族群分類效應則達顯著水準， $F(1, 76) = 13.04, p < .001$ 。在母親原國籍部分，主效應與交互作用效應也未達顯著水準，僅族群分類效應達顯著水準， $F(1, 76) = 14.40, p < .001$ 。上述有關年級、性別……等之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中，族群分類效應均達顯著水準，而交互作用效應則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論新移民子女的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或母親原國籍為何，他們對父方族群的主觀評價的確不同於他們對母方族群的主觀評價，且由表4可知，他們給予父方族群的較高的評價。

至於新移民子女對父方族群與母方族群的評價分數是否隨其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之不同而有差異（研究問題三），同樣是以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加以檢定，族群自我認同型態為受試者間因子，族群分類為受試者內因子。母方族群認同者與邊緣身分認同者因各只有一位，未包含於此變異數分析之內。此分析之結果顯示，認同型態主效應， $F(2, 73) = 10.37, p < .001$ ，與族群分類主效應， $F(1, 73) = 13.54, p < .001$ ，皆達顯著水準，然二者之交互作用效應亦達顯著水準， $F(2, 73) = 11.81, p < .001$ 。

由於有顯著之交互作用效應，研究者接續進行二組之單純主效應檢定。第一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之結果顯示，以父方族群態度分數為依變項時，認同型態有顯著效應， $F(2, 73) = 8.41, p < .001$ 。

平均數之事後比較（Scheffé法）顯示，雙族群認同者與情境身分認同者有顯著差異且前者高於後者，其餘認同型態間並無顯著差異。以母方族群態度分數為依變項時，認同型態亦有顯著效應， $F(2, 73) = 12.17, p < .001$ 。平均數之比較結果顯示，父方族群認同者之母方族群態度分數顯著低於雙族群認同者，其餘認同型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第二組（族群類別）之單純主效應檢定顯示，就父方族群認同者而言，族群分類效應達顯著水準， $F(1, 17) = 19.36, p < .001$ ；就雙族群認同者而言，族群分類效應亦達顯著水準， $F(1, 47) = 12.13, p < .001$ ；就情境身分認同者而言，族群分類效應則未達顯著水準。由表4可以看出，父方族群認同者與雙族群認同者給予父方族群較高的評分。惟此處值得一提的是，父方族群認同者在族群態度上有明顯的差別性評價，而這也是前述交互作用效應之主因。父方族群認同者的父方族群態度分數與其他認同型態者並無太大的差異，但他們給予母方族群的評分卻是最低、且明顯地低於他們給予父方族群的評分。

### 三、族群自我認同與自尊

最後分析的是新移民子女中之雙族群認同者是否比其他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有相對較高的自尊表現（研究問題四）。此分析前之相關分析顯示，受試者之自尊分數與父族態度分數（ $r = .57, p < .001$ ）及母族態度分數（ $r = .54, p < .001$ ），均有顯著之正相關，意指新移民子女對父方或母方族群的評價愈為正向者，其自尊表現也相對愈高；反之亦然。此外，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wo-sample  $t$ -test）的結果顯示，新移民子女的自尊分數並未因年級、性別、或母親原國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見表5），但單因子（學校規模）變異數分析顯示，主效應達顯著水準， $F(2, 75) = 5.40, p < .01$ 。平均數事後比較（Scheffé法）的結果是，就讀小型學校的新移民子女在自尊量表上的表現顯著高於就讀中型與大型學校的新移民子

表5 新移民子女自尊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自變項(因子)	類別/水準	M	SD
年級	五 ( $n = 46$ )	64.78	13.55
	六 ( $n = 32$ )	64.13	12.24
性別	男 ( $n = 38$ )	61.58	14.20
	女 ( $n = 40$ )	67.30	11.12
學校規模	小 ( $n = 13$ )	74.62 <sup>a</sup>	9.22
	中 ( $n = 53$ )	62.83 <sup>b</sup>	12.84
	大 ( $n = 12$ )	61.00 <sup>b</sup>	12.42
母親原國籍	越南籍 ( $n = 36$ )	64.33	12.02
	非越南籍 ( $n = 42$ ) <sup>1</sup>	64.72	14.13
族群自我認同型態	雙族群 ( $n = 48$ )	68.23 <sup>a</sup>	10.40
	情境身分 ( $n = 18$ )	58.70	9.79
	父族群 ( $n = 10$ )	57.44 <sup>b</sup>	17.00
	母族群 ( $n = 1$ ) <sup>2</sup>	76.00	-
	邊緣身分 ( $n = 1$ ) <sup>2</sup>	60.00	-

註：同一變項內各類別平均數之上標字母不同者表彼此間差異達顯著水準 ( $p < .05$ )。

<sup>1</sup>係指母親原國籍為印尼、菲律賓、緬甸、泰國、柬埔寨及馬來西亞之兒童。

<sup>2</sup>由於人數過少，未包含於變異數分析之內。

女，但後二者並無顯著的差異。至於自尊分數是否隨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之不同而有差異，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檢定，因為二因子（族群自我認同型態 × 學校規模）變異數分析並未產生顯著之交互作用效應。此分析結果顯示，認同型態效應達顯著水準， $F(2, 73) = 6.38$ ， $p < .005$ ， $\eta^2 = .15$ 。以Scheffé法進行平均數比較的結果是，僅雙族群認同者與父方族群認同者之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且前者高於後者（見表5）。

##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屬初探型研究，然其發現有助於我們對新移民子女自我認

同之瞭解。以下依序就主要發現進行討論，並說明研究限制及提出建議。

## 一、族群自我認同之多樣性

首先，本研究發現，在可以私下表述個人想法的情況下（如填寫匿名式問卷），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是相對多元的；此結果與以往質性研究（李國基 2008；馬藹萱 2005）的發現也是一致的。就比例而言，雙族群認同者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父方族群認同者，再其次才是情境身分認同者，而且其相對比例並不因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或母親原國籍而有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高達六成的新移民子女自認為同時擁有二種族群身分。換言之，他們認為自己是父方族群的一份子、也同時是母方族群的一員。亦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子女中雙族群認同的比例近似於美國雙族裔者的表現（Lusk et al. 2010; Rockquemore and Brunsma 2002），也明顯地高於單一族群自我認同的比例。換言之，雙族群認同乃新移民子女主要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亦即整體而言新移民子女有很明顯的同時認同父方與母方族群的心理傾向。

相較於上述三種族群自我認同型態，新移民子女自認為僅屬於母方族群的人數極少。此結果雖顯突出，卻合乎實情，畢竟對從小在臺灣成長的這些小孩而言，母方族群的能見度是相對很低的，遑論其他不利於母方族群認同的因素。即使如此，我們仍不可將此研究結果解讀為，新移民子女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母方族裔背景，原因在於有六成的雙族群認同者以及一成的情境身分認同者，都是願意承認自己有母方族群身分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般人的看法也並沒有錯，即絕大多數的新移民子女會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因為雙族群認同者、父方族群認同者、以及情境身分認同者的合計比例高達九成五以上，只是在意義或程度上，此三種認同型態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罷了。

惟由於本研究之對象為國小高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約莫11、12歲

左右的兒童在族群自我認同上的表現到底具有何種的意義呢？<sup>1</sup>有關這一點，我們需要借助於Poston（1990）的雙族裔自我認同發展模式來加以瞭解。這一個年齡層的新移民子女仍屬於第二（族群類別選擇）階段，因此他們的族群身分選擇主要是基於團體隸屬需求與人際互動需求的心理反應，且主要是受到族群相對地位及所知覺的社會支持度之影響。他們當中或許有一些人已經有「掙扎及否認」（第三階段）的經驗，但有更多的人才正要進入此關鍵階段，所以他們目前的族群身分認同並不完全是確定的。馬藹萱（2005：24）所研究的青春時期跨國婚姻子女即有此現象：有些人的族群自我認同是確信的，有些則對族群身分產生困惑或認為沒有意義而不願將自己歸類，也有一些會依據當下社會情境之要求及互動對象之期待，以「千面人」的方式來呈現適切的身分類屬。由於國小五、六年級的新移民子女往後仍要經歷「欣賞」（第四）以及「整合」（第五）階段，所以他們的族群自我認同形態仍有可能會有相當大的轉變，如由雙族群認同轉變至單族群認同或情境身分認同等。即使目前所認同的族群身分在名稱上與若干年後經由「欣賞」而且「整合」後的族群身分是相同的（如同樣是雙族群身分），二者在自我認同發展上的意義是不同的。

新移民子女在國小五、六年級的族群自我認同型態雖非其最終型態（ultimate status），甚至有一段距離，其目前的表現仍有其意義與影響作用。以其中約四分之一的單一族群認同者為例，他們的心理表現必然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其成長環境中的社會氛圍，如他們的母親不被其他家人尊重或對他們的教養沒有主導權等（莫藜藜、賴珮玲 2004）。同樣的，在新移民子女或多或少已經瞭解一般社會大眾對其母親有偏見的情況下，仍有六成願意承認自己的二種族群身分，可以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現象，而且想必有可支持此族群自我認同形態的社會支持因素（如父母的教導、正向親子關係、或學校宣導的多元文

1 此段論述主要受匿名審查委員所提意見之啟發，在此申明並表達謝意。



化課程等)。更重要的是，族群自我認型態不同的新移民子女所表現的族群態度及自尊亦有差異，表示他們的族群認同與心理適應是一起連動的。

## 二、父方族群認同者在族群態度上有較明顯之差別性評價

本研究的第二個重要發現是，有關新移民子女對父方族群的評價會高於母方族群的看法並不全然正確。無可否認的，若不考慮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則不論年級、性別、學校規模、或母親原國籍為何，他們對父方族群的主觀評價的確優於對母方族群的主觀評價。然而，若考慮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結果顯示只有父方族群認同者有明顯的差別性族群態度。此發現凸顯出單向度族群認同模式之侷限與不宜，而本研究採取雙向度族群認同模式探討新移民子女之族群態度，遂才得以發現此特別的現象。基於一般人都有「內族群偏好」的態度傾向（Griffiths and Nesdale 2006; Levin et al. 2003; Rustemli et al. 2000; Shams 2001; Valk and Karu 2001），此結果或可解釋為，父方族群認同者沒有把自己視為是母方族群的一份子，因而在態度評價上也沒有對母方族群表現出「內族群偏好」。然而，我們也不能將此結果誤解為他們對母方族群有極低的評價，因為他們的母族態度分數平均值仍略高於理論平均值<sup>2</sup>。所以，持平的說，他們對母方族群的評價只是略好於「普通」而已，而且明顯地低於他們給予父方族群的評價。

## 三、雙族群認同者之自尊表現高於父方族群認同者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雙族群認同的新移民子女在自尊的表現上優於父方族群認同者。此結果與以往研究者的發現一致（Bracey et al.

2 五點量尺的中點（「普通」）計分為3，父族與母族各11題，所以總分的理論平均值為33，而父方族群認同者的母族態度分數平均值為37。

2004; Lusk et al. 2010)，也呼應學者們有關雙族群認同具有緩衝效果的主張（Jones et al. 2007; Lusk et al. 2010; Shih and Sanchez 2005）。此緩衝效果是指，雙族裔個體如認同於所屬的二個族群，將有利於整合與汲取二個族群的文化資產，因而會發展出較好的能力以抗衡社會上的族群刻板印象、偏見、或差別待遇等，並因而有較好的心理適應（Kerwin et al. 1993; Poston 1990; Shih and Sanchez 2005）。然而，因為本研究並非因果關係之驗證研究，所以無法排除另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即有較高自尊之新移民子女也較為願意承認自己的二種族群身分，尤其是與母親有關的部分。除上述解釋之外，第三種情形亦為合理且有極大的可能性，亦即族群自我認同與自尊均受到其他因素之影響，如父親或母親的教養態度與能力、新移民本身的族群認同、或其成長環境的多元文化接受性等。

####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為客觀地評估研究發現之推論性，本研究的若干限制不可忽略。其一是抽樣方式與樣本人數。本研究抽樣範圍僅限於基隆地區，且有多所學校基於保護學生隱私而婉拒參與，以致於未能實施隨機抽樣程序。由於樣本代表性或有不足，研究發現的推論性亦將受限。其次，新移民在社區的能見度（人口比例）必然有地區之差異，連帶的可能會影響主流族群對新移民之接納程度、族群刻板印象或偏見等，並間接地影響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所以，基於單一地區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是否可推論至其他縣市，尚需先衡量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似性為宜。再者，本研究的樣本為國小五、六年級的新移民子女，其族群自我認同發展仍處於「族群類別選擇」階段（Poston 1990），因此其認同型態僅可視為此發展階段的表現，不可假定為在其他階段（如「掙扎及否認」階段或「整合」階段）也會有同樣的表現。其影響所及則為，本研究所發現的各認同型態（即雙族群認同、父方族群認同、及情境身分認同等）之相對比例亦可能會隨著發展階段而改變。

就未來研究而言，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尚有三個方向亟待實證探討。首先，後續研究需融入發展心理學的觀點，畢竟自我認同是一個連續的發展歷程。從此觀點看來，有若干問題很值得我們的關注，如新移民子女進入青春期且經歷「掙扎及否認」階段後，在族群身分選擇與族群態度方面會有怎樣的表現？國小高年級是雙族群認同的學生，有多少的比例會轉換為其他的認同型態（如父方族群認同、母方族群認同或情境身分認同）？新移民子女是否（或何時）會進入「欣賞」及「整合」二個階段，也就是說他們的族群自我認同要到什麼時候才会有相對持久的型態？新移民子女對母方族群的態度是否會隨著年齡而有更為正向或負向的發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其研究結果不僅可揭露新移民子女族群自我認同的穩定性，亦可藉以審視臺灣社會對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長期影響。

研究主軸二是探討新移民子女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的影響因素。根據族群認同的生態觀點（Pedrotti et al. 2008; Rockquemore and Brunnsma 2002; Root 2003），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會受到成長環境中許多因素的影響。由於語言乃人際互動的主要工具，也是通往族群文化的主要管道，所以新移民子女對母語（mother tongue）的通曉程度是一個優先要檢視的可能影響因素。在新移民子女的成長環境中，母方族群的語言始終是弱勢語言乃不爭的事實，然尤有甚者，為數不少的新移民在家裡不被鼓勵或被禁止使用最熟悉的語言與小孩交談（馮涵棣、梁綺涵 2008），以致於許多新移民的子女聽不太懂母語，或即便聽得懂，賴以溝通的能力與機會也非常有限。在母方族群語言與文化始終處於劣勢或近乎隱形的情況下，新移民子女實在不容易透過語言對母方族群與文化產生認同。然而，即使情況如此不利，仍有新移民透過許多「縫隙」（如家鄉食物與相片等）對其子女傳遞著點點滴滴的母方族群文化與日常生活語彙，而且她們的子女也能感知到「內蘊於身體深處的另一股隱約幽泉」（李國基 2008：123）。這些新移民子女所獲得的知識或許是片段的，難以拼湊出其母親家鄉

人文的全貌，但就其個人對母方族群的認同而言應該還是有助益的。後續研究者如就此進行探討，即可客觀評估母語熟練度對族群認同的影響。舉例而言，如果能說一口流利母語的新移民子女也都是雙族群認同者，很顯然的即可說明母語在新移民子女族群自我認同歷程的重要性。

新移民在其子女族群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後續研究的重點。由於是主要照顧者的緣故，新移民其實位居於一個很有利的位置。她們可用直接教導或增強的方式，將自己的族群文化資產（如語言、知識、價值觀、習俗等）傳遞給小孩；她們也是子女最常接觸的學習與模仿對象，尤其是在語言、生活態度、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等方面。近有研究顯示，新移民愈常利用機會和子女談論家鄉風俗民情者，其親子關係愈好，子女的族群認同也愈好（黃郁婷、林揚瑩 2013）。因此，後續研究可探討新移民的教養態度與技巧、社交能力、與情緒適應能力等對其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之影響，畢竟新移民在這些方面存有很大的個別差異。不過，必須提醒的是，女性新移民在這些面向所表現出來的能力會受到家庭生態因素的影響，其夫家對資源與權力（特別是教養權力）的掌控程度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先生甚至公婆涉入教養的程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sup>3</sup>女性新移民如能獲得夫家的充分信任與支持，則其本身的心理與社會適應以及對子女的教養能力才會有最大化的表現；相反的，如果女性新移民在夫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教養自主權，即便有心卻無法善盡母職，則不僅她們無法發自於內心地認同臺灣社會，其子女的族群認同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在探討新移民在其子女族群認同所扮演的角色時，還必須同時考慮新移民在夫家的地位與教養自主權，並思圖有效的加以控制或排除。

另一個亦需檢視的可能影響因素是新移民子女所知覺的社會大

3 此觀點乃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在此申明與感謝。

眾的族群刻板印象與偏見，尤其是針對新移民或他們自己的部分。臺灣長期以來自許為族群融合的多元社會，然許多人對東南亞女性新移民卻有不少的歧見，其例證便是經常見諸於報章媒體的有關於新移民或其家庭之負面報導，如婚姻是金錢交易或配偶的教育程度低且經濟弱勢等（夏曉鵠 2001；張敏華 2005；蔡臺鴻 2009）。種族歧視之知覺已被發現與族群身分的負面印象有關（Seaton et al. 2009），而且被發現可預測成績、學業功課價值觀、自尊與心理韌性等方面的下滑（Wong et al. 2003）。新移民子女如果經常聽到或看到有關於母方族群的負面批評或報導，心理不免感到難過或難堪；如果自己也遭受此類的嘲諷或侮辱，更有可能因而對自己的族群背景感到憤憤不平。久而久之，他們對母親的族群身分或許會產生負面觀感，而此負面觀感有可能導致族群認同的迷惘、衝突與矛盾（莫藜藜、賴珮玲 2004）。因此，後續研究有必要探討新移民子女對族群刻板印象或族群偏見的知覺，除可藉以瞭解新移民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亦可藉以剖析他們此方面的知覺對其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之影響。

後續研究的第三個主軸是有關於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與其他心理與社會適應指標的關聯。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除與自尊連動之外，也必然與同儕關係、同儕壓力易感性（susceptibility to peer pressure）、或成就動機等有程度不等的關聯性。舉例而言，父方族群認同者與雙族群認同者在同儕中的人緣或朋友的選擇上，就可能會有不小的差異。父方族群認同者有隱藏或否認其母方族群身分的傾向，可能較不願意和其他新移民子女來往，卻未必能夠被其他多數族群兒童所接納，所以其同儕關係可能會因而欠佳。此外，他們或許會急於想要獲得主流族群的接納，因而很容易順從於同儕壓力，並因而有較高機率會涉入抽菸、喝酒、甚至吸毒等有害健康的行為。反觀雙族群認同者，經由整合與汲取父母雙方族群文化後，他們可發展出多元知能，與同儕互動較有信心，可能對同儕壓

力也會有較好的應對策略與技巧。總之，我們也可以說，藉由第三個主軸的後續研究，我們可以客觀地評估，雙族群認同的新移民子女是否在心理與社會適應方面比單一族群身分認同者具有多方面的優勢。

在實務方面，本研究之發現有二個重要的意義。首先，基於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自我認同的多樣性，實務工作者（如教育人員、社工人員、與心理輔導工作者等）不可先入為主的以某一種族群認同型態概括所有的新移民子女；既不可認為他們清一色都是父方族群認同者，也不能假定他們都是雙族群認同者。同樣的，我們也要避免以主流族群的觀點來看待新移民子女的想法與作為，因為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或多或少同時蘊含母方族群的價值觀與思維。我們應該做的是，先充分的瞭解他們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經驗，並以開放接納的態度聽聽他們對自己的族群身分的看法。我們要表達出對他們的選擇與看法的尊重，更要特別留意我們所使用的言語或措施，以免言行不一，在不經意之間貶低他們或傷害他們的自尊。

第二，由於本研究也發現，雙族群認同者的自尊表現有優於單一族群身分認同者的現象，顯示雙族群認同比較有利於心理適應。荷蘭的研究則發現，在鼓勵或強迫認同於主流文化的環境下長大的個體，相較於在接納多元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個體，會表現出較為負面的族群態度（Coenders et al. 2008）。有鑑於此，社會大眾不應一味的強調單一主流文化與價值，媒體也不應選擇性的報導新移民的負面新聞，新移民的夫家更不可無情地要求她們不使用她們最擅長的母語，或不讓小孩接觸母方族群與文化。上述種種不利於雙族群認同的要求，不僅不利於新移民子女的人格發展與能力培養，而且最終也不利於臺灣社會的和諧與整體競爭力。新移民子女明明就擁有二個族群的文化資產，可以很自然的發展為具備多語言能力與多文化素養的個體，卻被硬生生的形塑為單一族群認同者，若其自尊也因而變差，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所以，臺灣社會要積極地改變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媒體要多多報導新移民的正面新聞，接納新移民的社區與家庭

更要客觀的承認新移民對其家庭以及對社會的付出與貢獻。我們要讓新移民以到臺灣定居為幸，讓他們的小孩以擁有雙族裔背景為榮。

在當前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時代，具有多國語言能力與多元文化素養即等同於站在較好的位置，可取得更好的競爭優勢（馮涵棣、梁綺涵 2008），這在臺灣或國際的就業市場上都是不變的道理。因此，基於培養國民素質與競爭力的必要性，政府、媒體與民間應該攜手營造一個友善接納且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而且要以政策鼓勵新移民的家庭讓小孩在家裡向媽媽學習媽媽的語言。學校應該持續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積極地設計可培養學生雙文化甚至多文化觀點及素養的課程與活動。臺灣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已日趨熱絡，我們需要會講東南亞語言以及瞭解東南亞社會與文化的人才，我們需要新移民子女充分地發揮雙族裔的優勢，為個人、家庭、與社會創造三贏的局面。

## 謝誌

作者要特別感謝協助研究資料蒐集之10所基隆市國小的校長、教師與學生們；沒有他們的協助，研究實在難以完成。本文初稿發表於2014年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4年4月24-25日，臺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作者要感謝該次研討會評論人齊力教授的指正與建議。最後，二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極有見地與建設性，使作者有更為周延的思慮，也在此衷心感謝。

airiti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移民署 (2014) 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 (含港澳) 配偶人數。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47109&ctNode=29699&mp=1 (取用日期: 2014年2月18日)。
- 內政部統計處 (2014a) 人口年齡分配。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取用日期: 2014年2月17日)。
- 內政部統計處 (2014b) 國籍之歸化取得人數。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取用日期: 2014年2月17日)。
- 王世英、溫明麗、黃乃熒 (2006) 我國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現況之研究。臺北: 國立教育資料館。
- 王宏仁 (2001) 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 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1: 99-127。
- 王德睦、劉一龍 (2008) 臺灣總生育率再分析——ACF法的運用。人口學刊, 36: 37-65。
- 吳毓瑩、蔡振州 (2014) 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之子女的學業成就真的比較差嗎? 與本地對照組比較之三年追蹤探究。教育研究集刊, 60(1): 77-113。
- 吳瓊洳、蔡明昌 (2009) 新移民子女文化認同與學校適應關係之研究——以雲林縣就讀國中階段之新移民子女為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33: 459-487。
- 李國基 (2008) 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雙族裔認同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 姚如芬 (2009) 探究低年級「新臺灣之子」的數學學習——以雲嘉南地區的學童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 18: 71-99。
- 夏曉鵬 (2000) 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9: 45-92。



-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3: 153-196。
- 馬藹萱（2005）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2005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臺北：臺灣社會學會，11月19-20日。
- 張芳全、夏麗鳳（2011）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0: 73-101。
- 張敏華（2005）「新臺灣之子」的媒體形象：外籍配偶子女之新聞框架研究。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教育部統計處（2014a）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94-102學年度）。[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fomas.xls](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fomas.xls)（取用日期：2014年2月10日）。
- 教育部統計處（2014b）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57-103學年度）。[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seriesdata.xls](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seriesdata.xls)（取用日期：2014年2月10日）。
- 莫藜藜、賴珮玲（2004）臺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05: 55-65。
- 陳玉華、蔡青龍（2011）東亞國家超低生育率的成因、困境與策略回應。人口學刊，42: 155-163。
- 陳佳伶（2007）國小學童自尊、因應資源與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馮涵棣、梁綺涵（2008）越南媽媽、臺灣囡仔：臺越跨國婚姻家庭幼兒社會化之初探。臺灣人類學刊，6(2): 47-88。
- 黃郁婷、林揚瑩（2013）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初探。學校行政，87: 202-221。
- 黃素惠、徐偉培（2008）新竹市新移民子女行為困擾與生活適應之研究。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7: 1-18。
- 劉一龍、王德睦（2005）臺灣地區總生育率的分析：完成生育率與生育步調之變化。人口學刊，30: 97-123。

蔡臺鴻 (2009) 外籍新聞的污名化——以新聞事件報導為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鍾鳳嬌、王國川 (2004) 外籍配偶子女的語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習狀況調查研究。教育學刊, 23: 231-258。

Aboud, F. E.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ttitudes." Pp. 32-55 in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Pluralism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J. S. Phinney and M. J. Rotheram. Newbury Park, CA: Sage.

Berry, J.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1): 5-34.

Binning, K. R., M. M. Unzueta, Y. J. Huo, and L. E. Molina. 2009.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racial Status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1): 35-49.

Bracey, J. R., M. Y. Bámaca, and A. J. Umaña-Taylor. 2004. "Examining 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mong Biracial and Monoraci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3(2): 123-132.

Breland, A. M. 1998. "A Model for Differential Perceptions of Competence Based on Skin Tone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6(4): 294-311.

Brunsma, D. L. and K. A. Rockquemore. 2001. "The New Color Complex: Appearances and Biracial Identity." *Identity* 1(3): 225-246.

Coenders, M., M. Lubbers, P. Scheepers, and M. Verkuyten. 2008.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Changing Ethnic Attitude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4(2): 269-285.

Coleman, V. H. and M. M. Carter. 2007. "Biracial Self-Identification: Impact on Trait Anxiety,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dentity* 7(2): 103-114.

- Doyle, A. B. and F. E. Aboud. 1995.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White Children's Racial Prejudice as A Social-Cognitive Development."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1(2): 209-228.
- Doyle, A. B., J. Beaudet, and F. E. Aboud. 1988.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the Flexibility of Children's Ethnic Attitud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1): 3-18.
- Erikson, E.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Gaskins, P. F. (ed.) 1999. *What Are You?: Voices of Mixed-Race Young People*. New York: Henry Holt.
- Griffiths, J. A. and D. Nesdale. 2006. "In-Group and Out-Group Attitudes of Ethnic Majority and Minority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0(6): 735-749.
- Harter, S. 199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elms, J. E. 1995. "An Update of Helms's White and People of Color Racial Identity Models." Pp. 181-198 in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edited by J. G. Ponterotto, J. M. Casas, L. A. Suzuki, and C. M. Alexan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ickman, C. B. 1997. "The Devil and the One Drop Rule: Racial Categories,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US Census." *Michigan Law Review* 95(5): 1161-1265.
- Holmes, S. A. 1997. "People Can Claim One or More Races on Federal Form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 Hutnik, N. 1991.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H. L., W. E. Cross, Jr., and D. C. DeFour. 2007. "Race-Related Stress,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Black Women."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33(2): 208-231.

- Kerwin, C., J. G. Ponterotto, B. L. Jackson, and A. Harris. 1993. "Racial Identity in Biracial Children: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0(2): 221-231.
- Levin, S., C. van Laar, and J. Sidanius. 2003. "The Effects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Friendships on Ethnic Attitudes in College: A Longitudinal Study."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6(1): 76-92.
- Lusk, E. M., M. J. Taylor, J. T. Nanney, and C. C. Austin. 2010. "Biracial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in Mixed Black/White Biracial Individuals." *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19(2): 109-126.
- Nguyen, H. H., L. A. Messé, and G. E. Stollak. 1999. "Toward a More Complex Understanding of Acculturation and Adjustment -- Cultural Involvements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Vietnamese Yout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0(1): 5-31.
- Pedrotti, J. T., L. M. Edwards, and S. J. Lopez. 2008. "Working with Multiracial Clients in Therapy: Bridg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9(2): 192-201.
- Phinney, J. S., B. Jacoby, and C. Silva. 2007. "Positive Intergroup Attitudes: The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1(5): 478-490.
- Poston, W. S. C. 1990. "The 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 A Needed Addi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9(2): 152-155.
- Renn, K. A. 2000. "Patterns of Situational Identity Among Biracial and Multiracial College Students."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3(4): 399-420.
- Roccas, S. and M. B. Brewer. 2002.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2): 88-106.

- Rockquemore, K. A. 1998.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Understanding the 'Biracial' Experience." *Race and Society* 2: 197-212.
- Rockquemore, K. A. and D. L. Brunnsma. 2002. "Socially Embedded Identities: Theories, Typologies, and Processes of Racial Identity Among Black/White Biracial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3): 335-356.
- Root, M. P. P. 1990a. *The Multiracial Experience: Racial Borders as the New Frontier*. London: Sage.
- Root, M. P. P. 1990b. "Resolving 'Other' Status: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Biracial Individuals." *Women and Therapy* 9(2): 185-205.
- Root, M. P. P. 1998. "Experiences and Processes Affecting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Biracial Sibling Projec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ental Health* 4(3): 237-247.
- Root, M. P. P. 2003. "Multiracial Families and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110-124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sup>nd</sup> ed., edited by J. A. Banks and C. A. McGee Bank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Rosenberg, M. 1979. *Conceiving the Self*.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th, W. D. 2005. "The End of the One-Drop Rule? Labeling of Multiracial Children in Black Intermarriages." *Sociological Forum* 20(1): 35-67.
- Rustemli, A., B. Mertan, and O. Ciftci. 2000. "In-Group Favoritism Among Native and Immigrant Turkish Cypriots: Trait Evaluations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Target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26-34.
- Seaton, E. K., T. Yip, and R. M. Sellers. 2009.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Racial Identity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80(2): 406-417.
- Shams, M. 2001. "Social Support, Loneliness and Friendship Preference Among British Asian and Non-Asian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9(4): 399-404.

- Shih, M. and D. T. Sanchez. 2005.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lications of Having Multiple Racial Identit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4): 569-591.
- Šmihula, D. 2009. "Defini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6(5): 45-51.
- Valk, A. and K. Karu. 2001. "Ethnic Attitudes in Relation to Ethnic Pride and Ethnic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5): 583-601.
- Wong, C. A., J. S. Eccles, and A. Sameroff. 2003.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o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School and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1(6): 1197-1232.

#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ttitudes in Children of Southeast Asian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Tsai-Yuan Chung\* Hwui-Lan Lin\*\*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ethnic attitudes, and self-esteem of children from families of Taiwanese males and Southeast Asian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Subjects were 78 5th- to 6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responded to a questionnaire inquiring about their self-ascribed ethnic identity, ethnic attitudes (how they evaluated paternal and maternal ethnic groups), and self-esteem (how they thought of themselves). Results showed that 48 of 78 (61.5%) children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bi-ethnic, 18 (23.1%) as exclusively paternal-ethnic, and 10 (12.8%) as situational; only one child identified herself as exclusively maternal-ethnic, and one child as belonging to neither group. Furthermore, it was found that these children's ethnic attitudes were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categor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bi-ethnic children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aternal ethnic group than did children of situational identity, and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maternal ethnic group than did children of paternal-ethnic identity, who in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Taipei.

E-mail: tchung@go.utaipei.edu.tw

\*\* Fulltime Teacher, Dong-Ao Elementary School, Nan-Ao, Yilan County

E-mail: lan10083@gmail.com

particular demonstrated conspicuously differential attitudes toward parental ethnic groups. Finally, children who hel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paternal or maternal ethnic group tended to report better self-esteem; however, when comparisons were made among these children, the bi-ethnic children report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levels of self-esteem than did children of paternal-ethnic identit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diversities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ttitudes as well a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ethnic attitudes, self-esteem, Southeast Asian female immigrants, children of immigrants***